

明代武当山志著录疏误补正

张全晓

明代是武当山和武当道教最为鼎盛的历史时期，武当山志的编修也蔚为大观。明代武当山志是武当道教的生动写照，也是道教官观山志的杰出代表，但明代武当山志的著录却屡有疏误，即使是《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新编天一阁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等权威目录学著作对明代武当山志的著录也多有不尽人意之处，需要加以补充和订正。

关键词：明代 武当山 武当山志 补正

作者：张全晓，1975年生，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生，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

武当山位于古均州（今湖北省丹江口市）境内，又名太和山、仙室山，是闻名遐迩的道教圣地，也是武当道教的发祥地。明代是武当山最为鼎盛的历史时期，武当山志的编修也蔚为大观，不仅数量较多，质量较好，而且修志意识较强，续修频率较高，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在修志实践和修志理论上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目前常见明修山志就有四部，即宣德六年（1431）武当山提调官钦差太常寺寺丞任自垣纂《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十五卷，嘉靖十五年（1536）湖广布政司右参议武当山提调藩臣方升纂《大岳志略》五卷，嘉靖三十五年（1556）内官监太监武当山提督内臣王佐修、均州学正慎旦等纂《大岳太和山志》十七卷，隆庆六年（1572）抚治郧阳右佥都御史凌云翼修、均州学正卢重华等纂《大岳太和山志》八卷。这四部明修山志前后相承，薪火相传，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山志体系，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山志文化。然而，遗憾的是，明代武当山志的著录却屡有疏误，即使是《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新编天一阁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等权威目录学著作对明代武当山志的著录也多有不尽人意之处，这既与明代武当山志的纂修盛况和学术价值很不对称，也与今天武当山日益扩大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很不协调。故笔者不揣谫陋，试为补正，以期抛砖引玉，且就教于方家。

1. 明朱睦㮮撰《万卷堂书目》卷二“杂志”载：

太和山志五卷，任自垣。^①

按：《太和山志》即任自垣纂《敕建大岳太和山志》，该志现有明刻本与明抄本见存，据其目录及内容可知，该志凡十五卷，即诰副墨二卷、玄帝纪一卷、括神区一卷、稽古迹一卷、集仙记一卷、采真游一卷、楼观部二卷、灵植检一卷、神物集一卷、录金石二卷、金薤编二卷。卷名

^① 朱睦㮮：《万卷堂书目》卷二，冯惠民、李万健等选编《明代书目题跋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080页。

皆以三字为题，盖仿陶弘景《真诰》之例。析篇立目，亦深受刘大彬《茅山志》之影响。

是故，《万卷堂书目》著录有疏误，“五卷”当为“十五卷”。

2. 明焦竑撰《国史经籍志》卷三“名山洞府”载：

太和山志十五卷，彭簪。^①

按：彭簪，字世望，江西安福人，正德丁卯（1507）乡举，官衡山知县，移倅常州，旋摄宜兴掾，擢知靖州，甫一月即乞归，筑玩易草堂，构卧云亭于石屋，自号石屋山人。山居十二年，年六十卒。有《衡岳志》、《了岩说志》等。考彭簪生平，与武当山并无渊源，其纂修《太和山志》的可能性不大。又考明代武当山志，惟任自垣纂《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勒为十五卷。

是故，《国史经籍志》著录疑有疏误，“彭簪”当为“任自垣”。

另，清钱谦益《绉云楼书目》卷一“地志类”亦载“彭簪《太和山志》十五卷”，所误同上。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八“地理类下”载“彭簪《衡岳志》八卷”，当是。

3.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艺文志二》“地理类”载：

太岳太和山志十五卷，洪熙中，道士任自垣编。^②

按：《太岳太和山志》即任自垣纂《敕建大岳太和山志》。该志纂成于宣德六年（1431），卷首有宣德六年（1431）三月任自垣《进大岳太和山志表》。另据该志卷四“括神区”记“东灵石泉、西灵石泉”有云：“右二泉在太上岩。高兀峻极，无水供其厨湑，因此人难留也。宣德三年，重整岩宇，瑞光叠现。十月十六日，于此纂修《太和山志》。”^③这说明任自垣编纂武当山志的工作至迟始于宣德三年（1428）十月。自宣德三年（1428）十月至宣德六年（1431）三月，是《太岳太和山志》的编纂时间。

是故，《明史·艺文志》著录有疏误，“洪熙”当为“宣德”。

4. 清黄虞稷撰《千顷堂书目》卷八“地理类下”载：

太岳太和山志十五卷，道士任自垣编。垣号瞻宇，为太和山提点，神仁宗常为瞻宇歌赐之。

太和山志蒐遗三卷。

陈绍承天府太和山志十七卷。^④

按：任自垣，字一愚，号蟾宇。自永乐十一年（1413）至宣德六年（1431），为武当山玄天玉虚宫提点（秩正六品），统领全山道教事长达十九年之久，深得明皇室的宠信。明仁宗曾为其作《蟾宇歌》。^⑤考蟾宇寓意高洁，与道教关系密切，很多高道皆以蟾宇作为名号。豫章胡俨《蟾宇歌序》即云：“大岳玄天玉虚宫提点任一愚，自少修真于茅山，以蟾宇自号，岂况然者。盖昔学仙之徒，若刘葛二师，一号海蟾，一号玉蟾，其有由来矣。然常闻内景之说，有日魂月魄之喻，不可以偏废也。苟滞于一，则所谓蓬莱，又隔凡尘矣。然刘葛二师，必有其旨。盖蟾食气

① 焦竑：《国史经籍志》卷三，冯惠民、李万健等选编《明代书目题跋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93页。

② 张廷玉等：《明史·艺文志二》，中华书局，1974年。

③ 任自垣：《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四“括神区”，弘治补刻本。

④ 黄虞稷撰，瞿凤起、潘景郑整理《千顷堂书目》卷八“地理类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22页。关于该条，瞿、潘所附校记云：“（一）卢校改山为官。（二）别本无仁字。”所谓“卢校改山为官”，疑即“卢校改山为官”，但任自垣为玉虚宫提点而非太和宫提点，故卢校亦误。所谓“别本无仁字”，则又误明仁宗为明神宗。另，四库全书本《千顷堂书目》著录为：“太岳太和山志十五卷，道士任自垣编。垣号瞻宇，为太和山提点，仁宗尝为瞻宇歌赐之。太和山志蒐遗四卷。陈绍承天府太和山志十七卷。”与瞿、潘校正本所载略有出入。

⑤ 歌词详见任自垣《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二“诰副墨”，弘治补刻本。

之物也，气固则形全，形全则精复。庄生曰：‘形全精复，与天为一。’二师之意，或者在此乎。一愚亦慕二师而名者耶。”^① 反观瞻字，则无斯义。黄氏失察，故误“蟾”为“瞻”，且误“明仁宗”为“神仁宗”。

又：《太和山志蒐遗》三卷今已失传，明赵琦美《脉望馆书目》及清钱曾《述古堂书目》亦有著录，然皆不著撰者。宣统《湖北通志》则据《千顷堂书目》将其与任自垣编《太岳太和山志》并载一处，且谓任自垣为其撰者。今以书名度之，是书有类地方志之志余或外编，当为囿于志体而未曾入志的各种资料的汇辑。至于其撰者究竟是任自垣还是另有其人，目前不得而知。

又：《承天府太和山志》十七卷，明赵琦美《脉望馆书目》及清钱曾《述古堂书目》亦有著录，然皆不著撰者。今考承天府乃明世宗生父兴献王朱祐杭藩邸所在地湖广安陆州（今湖北省钟祥市），嘉靖十年（1531）升府，其境内并无所谓太和山，相关府县志中亦无记载。所谓承天府太和山，当即均州武当山。明世宗朱厚熜曾在《御制重修大岳太和山玄殿纪成之碑》中说：“朕皇考封藩郢邸，实当太和灵脉蜿蜒之胜，岁时崇祀惟谨。”^② 朱祐杭的藩邸兴王府毗邻武当山，朱祐杭父子又非常崇奉武当山玄天上帝，这大概就是所谓承天府太和山的由来。今考明代武当山志，惟嘉靖三十五年（1556）内官监太监武当山提督内臣王佐修、均州学正慎旦等纂《大岳太和山志》勒为十七卷，且其卷首王佐自序和卷末陈诏后序皆云郡人陈诏为该志的校订者，则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所谓“陈绍承天府太和山志十七卷”，疑即王佐修、慎旦等纂、陈诏校订的《大岳太和山志》十七卷，“陈绍”为“陈诏”之误。

是故，《千顷堂书目》著录有疏误，“瞻字”当为“蟾字”，“神仁宗”当为“明仁宗”，“陈绍承天府太和山志”当为“陈诏校订太和山志”。

5. 清纪昀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十六“史部地理类存目”载：

《太岳太和山志》十七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田玉撰。玉不知何许人，万历中宦官也。太和山即湖广均州之武当山，相传为北极玄武修真地。明成祖即位时，自谓得神之祐，因尊为太岳，敕建宫观，常遣内臣司其香火。嘉靖间，提督太监王佐始创为志，太监吕评续增之。万历癸未，玉复增广为此本。前载修建庙宇始末实事，并仙迹、徵应、物产，后载唐、宋、元、明序记诗赋等作。^③

按：内官监太监武当山提督内臣王佐修、均州学正慎旦等纂《大岳太和山志》十七卷初刻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以后屡有补刻。现存明刻本为嘉靖四十年（1561）内官监太监武当山提督内臣吕祥的增刻本，卷首有吕祥《续大岳太和山志序》。今考明代武当山志关于历任提督内臣姓氏的记载，也只有一个吕祥，而并无所谓吕评，故吕评当为吕祥，盖因“评”、“祥”形近而误。吕祥，直隶蠡县人，嘉靖三十六年（1557）由内官监太监提督武当山。作为王佐的继任者，吕祥也以修志为己任。他在《续大岳太和山志序》说：“祥虽庸劣之质，尸素备员，继王公之后尘，亦尝奉敕谕之责委，叨恩赉之频渥，兹特续入志内，非炫耀于人。实不敢忘君之赐焉。”^④ 吕祥依原志之体例，将其所奉敕谕和所受恩赉等事续入志中，增加了志书的内容。万历十一年（1583），内官监太监武当山提督内臣田玉又复为增刻。据凌云翼修、卢重华等纂《大岳太和山志》天启递修本卷四“职官姓名”记载，田玉乃陕西西安府华州华阴县人，由司礼监太监调内官监太监，万历十一年（1583）奉敕提督武当山^⑤。四库馆臣未见该志，故不知田玉为何

① 任自垣：《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十五“金薤编”，弘治补刻本。

②④ 王佐：《大岳太和山志》卷二“历代御制”，嘉靖四十年（1561）吕祥增刻本。

③ 永瑢、纪昀主编，周仁等整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十六“史部地理类存目”，海南出版社，1999年。

⑤ 凌云翼：《大岳太和山志》卷四“职官姓名”，天启递修本。

许人也。田玉增刻本今已无传，殊为可惜，然度其所增内容，当益加多。

又：武当山作为名山胜地，很早就开始了修志活动，并形成了优良的修志传统。迄今所知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武当山志，是元代武当道人刘道明所编《武当福地总真集》三卷。该志成书于元世祖至元辛卯年（1291），后被收入《道藏》“洞神部记传类”中，幸赖《道藏》以传。因该志不以山志为名，故不为四库馆臣所知。四库馆臣既弗识元代刘道明所编《武当福地总真集》，又失察宣德六年（1431）任自垣纂《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和嘉靖十五年（1536）方升纂《大岳志略》，遂有“嘉靖间提督太监王佐始创为志”之误。

是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有疏误，田玉有传而失录，“吕评”当为“吕祥”，武当山志亦非王佐始创。

6. 王重民编著《中国善本书提要》“史部地理类山水志”载：

太岳太和山志八卷

四册（《四库总目》卷七十六）（国会）

明隆庆间刻本【九行十八字（19.2×14.2）】

明卢重华编次，李贵和订正。据凌云翼序，称其“至均，首索《山志》阅之，乃出中贵人所刻，而序诸简首，未称也。遂檄均之学正卢重华为之编次，而属藩参议李君订正之，共彙为八卷，副知州张著登梓”。《存目》著录本作十七卷，《提要》云：“嘉靖间提督太监王佐始创为志，太监吕评续增之。万历癸未，玉复增广为此本。”按《山志》为任自垣所创始，王佐殆改换任《志》，攘为己有。考是书卷四载《提督内臣姓氏》，“王佐，直隶易州人，嘉靖十八年任。吕祥，直隶蠡县人，嘉靖三十六年任。田玉，陕西华阴县人，由司礼监太监调内官监太监，万历十一年任”。则吕评应作吕祥。余疑《山志》自任自垣创始，王佐盖未有修补，至吕祥始增为十七卷，即《存目》著录之本。盖自卢重华重修，吕本仍在流行，故田玉仍就吕本增窜，而与是书并行。是书纪事至万历四十三年，凡记万历间事者，皆后来补版也。

凌云翼序【隆庆六年（一五七二）】^①

按：抚治郧阳右佥都御史凌云翼修、均州学正卢重华等纂《大岳太和山志》八卷，是迄今所知明代最后一部官修武当山志。该志初刻于隆庆六年（1572）夏，以后屡有递修。据笔者所见，现存明刻本有隆庆六年（1572）初刻本、万历年间补刻本和天启年间递修本。隆庆六年（1572）初刻本页九行，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双边，约十二万字。卷首有凌云翼自序，正文凡八卷二十余目。万历年间补刻本又称九卷本，递修内容悉附卷八后，谓之卷九或补遗，内容均为艺文，收录近二十人十余种体裁的作品约二百篇，凡三万五千字。天启年间递修本仍为八卷本，卷目设置悉同初刻，唯卷六较初刻本多告文一目。考其续入内容，各卷各目多少不等，亦有未经续入之卷目。除卷四“职官姓名”外，新增内容不是很多。今考王重民先生所见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大岳太和山志》八卷，实为天启年间的递修本，因其卷六载有钦差审录湖广刑部山东清吏司员外郎徐仪世所撰《虔祈玄武尊神护国福民告文》一篇，题下自注为天启二年（1622）壬戌仲冬朔日。王先生所谓“是书纪事至万历四十三年”的说法不确，殆因该志卷四“职官姓名”记提督内臣张时有云：“张时，河间府静海县人，由司礼监提督调内官监太监，万历四十三年任。”^②王先生可能未曾细阅该志，未见徐仪世告文自注时间，故据张时到任时间，误以为纪事至万历四十三年（1564）。

又：王先生不仅纠正了四库馆臣误“吕祥”为“吕评”之谬，而且否定了四库馆臣关于“嘉靖间提督太监王佐始创为志”的说法，转而认为“山志自任自垣创始”，这显然较四库馆臣

①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史部地理类山水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08-209页。

② 凌云翼：《大岳太和山志》卷四“职官姓名”，天启递修本。

识见高明。但王先生关于山志始自任自垣的论断亦与事实不符,元代刘道明所编《武当福地总真集》才是迄今所知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武当山志。任自垣在《进大岳太和山志表》中有云:“臣闻圣代之兴,必有圣代之制作。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不可口传,必稽诸典。伏睹大岳太和山,历代尊崇,祀典所载,朝廷封建,旷古未闻,若不集成志书,尤恐盛事无考。遵依前代《总真集》,续入圣朝恩赐,总成志书。庶几万世之下以永其传也。”^①所谓“遵依前代《总真集》”,即谓任自垣修志时是有所本源,而非空穴来风。以王先生之慧眼卓识,当易知之,殆亦因未及细阅该志之故。至于王先生对王佐修志的否定,因王佐山志尚存,其误自不言而喻。

又:王先生据该志卷首凌云翼自序,认为该志由卢重华编次,李贵和订正。今考凌云翼自序云:“至均,首索《山志》阅之,乃出中贵人所刻,而序诸简首,未称也。遂檄均之学正卢重华为之编次,而属藩参议李君订正之,共彙为八卷,副知州张著登梓。志成,李君谒余为叙其事。”^②该志由均州学正卢重华编次,由均州知州张著刊刻,都毫无疑问,但订正者藩参议李君究竟是谁,却未曾明言。王先生之所以认定这个藩参议李君就是李贵和,殆因卷首凌云翼自序落款为“皇明隆庆六年夏都察院右金都御史奉敕提督抚治郧阳等处地方吴郡凌云翼撰”,而其卷四“职官姓名”中又有李贵和“隆庆六年任参议”这样的记载,凌云翼作序的时间与李贵和任参议的时间均为隆庆六年(1572),这大概就是王先生认定该藩参议李君即李贵和的重要依据。但实际上隆庆六年(1572)任藩参议的李君并非李贵和一人,还有一个李存文,而且李存文任职在前,李贵和继任在后。那么,凌云翼序中提及的这个藩参议李君,有没有可能不是李贵和而是李存文呢,问题的关键是要弄清楚李贵和与李存文的具体任职时间,然后比较他们谁更有机会订正山志并请凌云翼作序。据万历六年(1578)抚治郧阳右副都御史徐学谟修、襄阳府文学掌故周绍稷等纂《郧阳府志》卷九“秩官表”记载:“李存文,直隶太州人,进士,隆庆五年任参议。李贵和,河南祥符人,进士,隆庆六年任参议。”^③这与凌云翼山志卷四“职官姓名”所记雷同,也只有两人的任职年份而无任职月份。但据凌云翼山志卷三“敕提督藩臣”可知,李贵和奉敕提督武当山是在隆庆六年(1572)五月二十四日。而从奉命到莅任,又有一个必要的时间过程,用于处理公干和个人私务,以及旅途所需。如方升嘉靖十四年(1535)就接到提督武当山的敕谕,但直到次年三月才到任^④。又如凌云翼隆庆五年(1571)五月就有郧阳抚治之命^⑤,但直到当年八月才到任^⑥。李贵和从隆庆六年(1572)五月二十四日奉命提督武当山到正式到任,估计至少也还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而据凌云翼自序可知,他自隆庆五年(1571)八月到任不久,就开始召集卢重华等人重修山志,至隆庆六年(1572)夏应邀作序时,山志业已修成。从时间上来看,李贵和几乎没有订正山志并请凌云翼作序的可能。反观李存文则不然,他不仅与凌云翼同年到任,而且同为南直隶人,山志修成时,两人业已共事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共同修志的可能性很大。还有一个重要的佐证是,王先生所见是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天启递修本,而非隆庆六年(1572)初刻本,递修本卷四“职官姓名”中不仅有李贵和的名字,卷三“敕提督藩臣”的最后一

① 任自垣:《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首《进大岳太和山志表》,弘治补刻本。

② 凌云翼:《大岳太和山志》卷首自序,隆庆六年(1572)初刻本。

③ 徐学谟修、周绍稷等纂《郧阳府志》卷九“秩官表”,万历六年(1578)刻本。

④ 参方升:《大岳志略》卷首自序云:“嘉靖癸巳,督屯唐、邓间,庶几望见诸道子之宫,而又不欲越他境以勤邑人,乃止。甲午,提调命下,升奉以趋。曰:‘兹命也,将得以指挥其宫事,行有辞矣。’明年三月,既至,观于净乐。”

⑤ 参《明穆宗实录》卷五十七“隆庆五年(1571)五月丁卯”条记载:“升河南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凌云翼为右金都御史,提督抚治郧阳。”

⑥ 参徐学谟修、周绍稷等纂《郧阳府志》卷三十“艺文”载凌云翼《重修迎恩观记》云:“隆庆五年八月十三日,余奉命来抚郧阳。十七日,恭遇今上千秋令节,先一日习仪迎恩观。”

道敕谕也是下给李贵和的,这似乎进一步认可了王先生关于该藩参议李君即李贵和的判断。但实际上初刻本才是最有说服力的原始文献,今考初刻本全书,内中并无关于李贵和的任何记载,卷三“敕提督藩臣”的最后一道敕谕是下给李存文的,卷四“职官姓名”所载最后一位提督藩臣也是李存文。如果订正山志并请凌云翼作序者确系李贵和的话,初刻本中按常理就应该有对李贵和的一些记载,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李存文较李贵和订正山志的可能性更大。

是故,《中国善本书提要》著录有疏误,“李贵和”当为“李存文”,“纪事至万历四十三年”当为“纪事至天启二年”。

7. 王重民编著《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史部地理类山水志”载:

太岳志略五卷

三册(北图)

明嘉靖间刻本【十一行二十二字(19.7×13.7)】

明方升撰。升号定庵,婺源人。嘉靖十三年为太岳山提调,因旧志纂为是书,故名曰:“略”。按山志始纂于任自垣,当即升所谓旧志;《四库总目提要》以为始自王佐者误。佐提督山事在嘉靖十八年,是志已先两年刻成。余未见王佐山志,然相距甚迹,不需重修,佐如有志,殆即改换此志而成者。

王镛序【嘉靖十六年(一五三七)】

自序【嘉靖十五年(一五三六)】^①

按:方升纂《太岳志略》是迄今所知明代第二部武当山志。方升自序云:“既归,取志读之,曰:该矣悉矣,无所不载矣。读之卒篇,曰:夸而俚,博而寡要,其犹有未尽乎。乃忘其愚,辑为此编。汰十之五,增十之三,为之概括一百四十六处,杜述者十有九首,类为五卷。”^②诚如王重民先生所言,方升《太岳志略》是对旧志也就是任自垣《敕建大岳太和山志》的重新整合,以期拨正其“夸而俚,博而寡要”的弊端,故其志书形态亦从尚繁转为尚简。王先生不仅指出了方升《太岳志略》与任自垣《敕建大岳太和山志》的承继关系,而且否定了四库馆臣关于山志始自王佐的错误说法,可谓慧眼卓识。但王先生所谓山志始自任自垣的说法也不准确,疏误之处已具前所述。

又:王先生云:“佐提督山事在嘉靖十八年,是志已先两年刻成。余未见王佐山志,然相距甚迹,不需重修,佐如有志,殆即改换此志而成者。”王先生既未见王佐山志,又据山志重修的一般规律,遂认为王佐无需重修,即使重修,也是改换方升旧志而成。今考方升山志乃祖述七略、地理略诸作而为名者,凡五卷,析为五略,一卷一略,依次为王言略、人物略、宫观图述略、艺文略和杂考略,每略皆前加叙言,后附按语。王佐山志凡十七卷二十余目,卷一为玄岳总图、宫观分图;卷二为玄帝圣纪、历代御制;卷三为敕创建宫观、敕重修宫观;卷四为钦降像器;卷五为敕蠲免征差(佃户附);卷六为敕护山场(添设道职附);卷七为敕存留香钱;卷八为敕提督内臣;卷九为敕提督藩臣;卷十为上供仙品;卷十一为钦赐金币;卷十二为仙真异迹;卷十三为祯祥效应;卷十四为灵产物类;卷十五为职官姓名(提点附);卷十六为序、记、赞;卷十七为诗、歌、赋。方升山志尚简,意在揄扬名山,为游人香客指示游山路径。王佐山志尚繁,意在彰显明代诸帝修建武当山的功烈,以期播扬圣世之盛。王佐新志与方升旧志从修志动机到内容体例都有很大的出入,王先生所谓“佐如有志,殆即改换此志而成”的说法显然有误。至于王先生对王佐修志的否定,更与事实不符。王先生乃近代文献学巨擘,论理当不致有此纰误。笔者愚见,此皆与明代武当山志之流传不广有关。明代武当山志的编修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成

①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史部地理类山水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14页。

② 方升:《大岳志略》卷首自序,嘉靖三十三年(1554)补刻本。

就,但乾隆九年(1744)王概重修武当山志时即感慨“惜前明所编已烬于兵燹之余”^①,认为明修山志已亡于兵燹,故不可得。可见明修山志至清初已湮没无闻,罕为人知,甚至被目为佚书,这就难怪如王先生这样的卓然大家也无缘窥见明代武当山志之全貌。此外,王先生所谓“相距甚远,不需重修”的观点,道出了山志编修的一般规律,但明代武当山志的编修却跳出了这个一般规律,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武当山修志意识之强和重修频率之高。

是故,《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著录有疏误,王佐修志不仅事实确凿,而且是创为新志,并非改换方升旧志而成。

8. 骆兆平编著《新编天一阁书目》天一阁遗存书目“史部地理类专志”载:

太岳太和山志十五卷存二卷

明任自垣撰。明嘉靖十二年重刻本,一册。存卷十四至十五。太和山即湖北均州之武当山。^②

按:宁波天一阁藏任自垣纂《太岳太和山志》十五卷,现存卷十四至卷十五,确系嘉靖年间重刻,但重刻时间不是嘉靖十二年(1533),而是嘉靖二年(1523)。据民国年间冯贞群《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劫余书目第二“史部地理类山川之属”记载:“太岳太和山志十五卷,明任自垣撰。太和山即湖广均州之武当山,相传为北极玄武修真地,明成祖即位时自谓得神之佑,因尊为太岳,敕建宫观,常遣内臣司其香火。明嘉靖二年太监潘真、赵荣重刻本,存二卷(卷十四至卷十五)。”^③很显然,冯贞群《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与骆兆平《新编天一阁书目》著录嘉靖年间重刻任自垣山志的具体时间并不一致,那么究竟是嘉靖二年(1523)还是嘉靖十二年(1533)呢。虽然冯目在前,骆目在后,但这并不能作为论定冯是骆非的最终依据。不过,冯目的著录内容远较骆目为详,尤其是它记载了重刻者的身份和姓名,这就为我们的判断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今考太监潘真、赵荣均为武当山提督内臣,虽然武当山提督内臣正常情况下额设一员,但也有过两位甚至三位太监同时提督武当山的时候,潘真和赵荣即其一例。据王佐修、慎旦等纂《大岳太和山志》卷八“敕提督内臣”记载,潘真提督武当山始于正德十三年(1518)三月,止于嘉靖三年(1524)七月,赵荣提督武当山始于正德十六年(1521)八月,止于嘉靖五年(1526)三月,两人共同提督武当山的时间为正德十六年(1521)八月至嘉靖三年(1524)七月。由是观之,嘉靖二年(1523)恰好处在两人同时提督武当山的时间段内,而嘉靖十二年(1533)时两人则早已先后离开武当山,各奔东西多年。因此,潘真和赵荣从情理上说不可能于嘉靖十二年(1533)再走到一起,共同主持对任自垣山志的重刻。也就是说,他们重刻任自垣山志的时间只能是嘉靖二年(1523)而非嘉靖十二年(1533),是骆兆平《新编天一阁书目》的记载出现了疏误,重刻时间当以冯贞群《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为准。

是故,《新编天一阁书目》著录有疏误,“嘉靖十二年”当为“嘉靖二年”。

9.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地理类山水志”载:

太岳太和山志十五卷,明任自垣撰,明刻本,存十四卷(二至十五)。

太岳太和山志十五卷,明任自垣撰,明嘉靖十二年刻本,存二卷(十四至十五)。

大岳太和山志十七卷,明慎旦、贾如愚等撰,明嘉靖三十五年王佐刻本。

大岳太和山志八卷,明卢重华撰,明隆庆六年张著刻本。

① 王概修,姚士慎等纂《大岳太和山纪略》卷首自序,下荆南道署藏版,乾隆十年(1745)刻本。

② 骆兆平:《新编天一阁书目》天一阁遗存书目“史部地理类专志”,中华书局,1996年,第91页。

③ 冯贞群编《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劫余书目第二“史部地理类山川之属”,民国二十九年(1939)活字本。

大岳太和山志九卷，明卢重华撰，明隆庆六年张著刻万历递修本。^①

按：任自垣纂《太岳太和山志》十五卷，现有两种明刻本见存。明刻本甲藏北京国家图书馆，记事至弘治七年（1494），殆为弘治年间补刻，现存十四卷，但内缺卷六而非卷一。明刻本乙藏宁波天一阁，现存卷十四至卷十五，但重刻于嘉靖二年（1523）而非嘉靖十二年（1533）。

又：王佐修、慎旦等纂《大岳太和山志》十七卷初刻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现存明刻本为嘉靖四十年（1561）内官监太监武当山提督内臣吕祥的增刻本，而非嘉靖三十五年（1556）王佐的初刻本。

是故，《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有疏误，“存十四卷（二至十五）”当为“存十四卷（内缺卷六）”，“嘉靖十二年”当为“嘉靖二年”，“嘉靖三十五年王佐刻本”当为“嘉靖四十年吕祥增刻本”。

10. 翁连溪编校《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史部地理类山水志”载：

太岳太和山志十五卷，存十四卷（二至十五），明任自垣撰，明刻本，十三行二十二字至二十四字，黑口，四周单边。

大岳太和山志十七卷，明那个旦、贾如愚等撰，明嘉靖三十五年王佐刻本，十行二十字，黑口，四周双边。

大岳太和山志八卷，明卢重华撰，明隆庆六年张著刻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双边。

大岳太和山志九卷，明卢重华撰，明隆庆六年张著刻万历递修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双边。

大岳太和山志九卷，明卢重华撰，明隆庆六年张著刻万历天启递修本（卷一至二配清抄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②

按：《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对明代武当山志的著录，在版本信息方面较《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更为详细，有了明显的深化。但《中国古籍善本总目》不仅延续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个别著录疏漏，而且新增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舛误。如误“慎旦”为“那个旦”，误“卢重华”为“户重华”，这些疏误对熟悉明代武当山志的人来说虽算不上什么障碍，但对那些不了解明代武当山志的人来说，麻烦可就大了。之所以出现这种比较低级的疏误，估计是编校把关不严所致，但因《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在学术界的影响很大，这些疏误还是不容小觑，希望再版时能予以补正，为明代武当山志正名。

是故，《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著录有疏误，“存十四卷（二至十五）”当为“存十四卷（内缺卷六）”，“嘉靖三十五年王佐刻本”当为“嘉靖四十年吕祥增刻本”，“那个旦”当为“慎旦”，“户重华”当为“卢重华”。

由是观之，明代武当山志的编修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因其流传不广，罕为人知，故历代文献著录屡有疏误，这不仅影响了人们对明代武当山志的正确认知，也说明目前学术界对明代武当山志的研究还很薄弱，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和强化，明代武当山志的学术价值也还有待进一步的挖掘和整理。对于那些已经发现的著录疏误，笔者也真诚地希望能够得到及时补正，以免继续贻误学人。

（责任编辑：于光）

①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地理类山水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016页。

② 翁连溪编校《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史部地理类山水志”，线装书局，2005年，第521页。